

## 从全视角探析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因

牛丽燕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省石家庄市, 邮编: 050010)

**摘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的原因是国内外多种因素交织合力作用下的结果, 促使其运动发起的原因可从外因和内因两个视角进行探析。外因是指国际形势, 主要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敌对和共产主义阵营内的“动乱”。内因则着眼于国内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多种影响因素, 主要有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层的决策和理论问题, 多种社会思潮尤其是“左倾”思想的影响, 国家战略任务的影响以及对集中动员体制的运用。

**关键词:** 农村 人民公社化运动 成因 左倾思想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一场不顾客观条件、争相推动农业集体生产组织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的普遍的群众性运动。1958年, 中共中央在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全国很快形成了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sup>①</sup>

目前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研究, 学界大多关注这场运动整体发展脉络的论述, 以综合化视角评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始末, 安贞元和罗平汉学者是其中重要代表。<sup>②</sup>然而, 截至目前, 对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起因问题, 国内外史学界还没有系统的专门论著问世, 一些通史或其他专题论著则稍微提及了此问题<sup>③</sup>。其中尤其是薄一波学者<sup>④</sup>以运动亲历者的身份, 展现了当时中共领导层决策问题与我国社会形势的真实面貌, 为学界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提供了有益价值。但是其不足在于此专著着眼于中国现代史重大事件的回顾, 并未从全视角系统和细化探究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之因。反观期刊论文, 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马晓兵学者<sup>⑤</sup>撰写相关研究综述, 将学者对其成因的看法归结为六方面, 然而其述评的观点皆是从我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958年8月29日),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

<sup>②</sup> 安贞元:《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罗平汉:《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年。

<sup>③</sup> 何学慧:《新中国历程探微》,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李扬、武力:《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研究》,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0年。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年。

<sup>④</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年。

<sup>⑤</sup> 马晓兵:《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原因研究述评》,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1

国内视角出发，忽视了国际局势的影响，难以体现以全球化视角探究历史的史学态度。李梅学者<sup>①</sup>对其成因的探究关注到了国内外双重视角，论述也较为详实，然而并不全面，没有系统梳理成因的多重影响因素。此外，还有学者以专题化视角专门论述某一因素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的作用，比如从“左倾”思想和农民心态入手<sup>②</sup>。总体来说，学界对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因研究已有一些显著成果，不过研究探讨还比较薄弱，体现为因素的缺失和片面，不能全面地总结出所有影响因素。有鉴于此，本文着眼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的国内外形势背景，秉持基于史料贴近历史原貌的初心，对其成因做一探析，以反映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局势，并对其原因力争做到准确的、全面的论述，希冀深化相关研究。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产生，这并非偶发的、突然的，而是当时国内外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内因和外因共同影响的结果。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sup>③</sup>因此探讨这一运动发起之因，应当关注历史语境，将其置于人民公社化运动前后的特定历史时代背景下进行分析，以全球史观对国内外多重因素的作用进行考察。正确认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成因，对梳理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和深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探索历程有着重要意义，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起着有益的教训作用。

## 一、外因：国际形势与共产主义阵营作用

一国的发展必然离不开其他国家的影响，理顺国际形势或者说国际势力对我国发展的重大作用是必要的也是首要的，方可在其后深化对我国出现的各种社会因素的理解。因此，探析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因，国际环境是首先需要考虑的。

### （一）两面的国际形势

#### 1、资本主义国家阵营敌对封锁

国际形势的不利一面是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敌对封锁。建国后国际上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和斗争，中国奉行社会主义制度，同时由于与苏联关系密切，使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阵营。于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实行敌对封锁政策，企图遏制中国。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

期。

<sup>①</sup> 李梅：《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因及影响研究》，《中共陕西省委党校》2015年第3期。

<sup>②</sup> 张桂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社会思潮问题》，《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黄金魁：《农民社会心态与人民公社化运动》，《零陵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sup>③</sup>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12页。

实行“禁运”提案，致使参加“禁运”的国家达 36 个之多。这次“封锁、禁运”直到 1972 年 2 月签署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为止，持续达 22 年之久。<sup>①</sup>为了打破其封锁，中国迫切需要加快发展步伐以提高生产力水平。党认识到了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关系起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于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作为改革生产关系的一次尝试在这种追求高速度的形势下兴起。

## 2、较为和平的国际局势

国际形势的有利一面是中国通过自身努力争取到了较为和平的国际局势。中国坚定社会主义阵营，得到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此外，中国通过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在国际外交上大放异彩，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的友好态度。党中央在制定建设规划时，也将这较为和平的国际局势纳入了考量。党中央认为“世界和平与合作力量的影响日益增强，估计可能出现 10 年到 12 年的和平时期，我们应当利用这一和平时期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建设”。<sup>②</sup>历史证明，中央对和平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抓住和平契机实现发展是符合实际需要的。然而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中国渴望抓住契机实现快速发展的心理逐渐转为了急于求成和不顾经济发展规律的错误心态，在思想上促进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展开。

后世多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发动多有诟病。不过，综上两方面国际形势的论述，试想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中国本身就积贫积弱，时刻面对着外国的虎视眈眈，同时又有着不确定的侵华战争或国际战争的随时爆发。因此在这个和平的契机实现高速发展是全国上下人心所愿，更是形势所逼。其后我国爆发追求高速度改革生产关系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迫切的想要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何尝不是奋发图强精神的一种体现呢？这是无可责难的，也不可站在后世的制高点上过分苛责。

### （二）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作用

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主要是指以苏联为首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公社化运动前后，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比较动荡，主要体现在中苏关系出现破裂以及反苏反共的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十月事件，对此我国党中央和领导人高度重视。后来的实践证明，中苏关系的破裂使两国出现了非理性竞争，国内“赶超”思潮盛行；此外，毛泽东对波匈事件的警惕直接促进了整风运动的发起，间接促成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从而在“左倾”思潮弥漫下人民

<sup>①</sup> 转引自董志凯：《应对封锁禁运：新中国历史一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84 页。

<sup>②</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年，第 370 页。

公社化运动应运而生。

## 1、苏联的重大影响

### (1)、中苏非理性竞争

首先，中苏关系破裂致使两国之间进行了非理性竞争，造成我国国内“赶超”思潮盛行，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提供了外部竞争背景。建国后，中苏一直保持团结互惠的盟友关系。奈何好景不长，中苏关系在五十年代末出现了破裂。赫鲁晓夫召开苏共二十大严厉否定斯大林，毛泽东则持不同意见，认为应辩证看待斯大林，两国领导人在此问题上产生分歧。与此同时，西方一些国家借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掀起了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攻势，中共对赫鲁晓夫的做法自是不满。此外，中苏两国几乎同时开始走出斯大林模式的尝试。赫鲁晓夫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被中共斥为“修正主义”。<sup>①</sup> 中国也开始摸索自己的道路，党中央提出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正是如此造成了两国关系破裂，其根本原因在于两国意识形态的分歧：中国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国家道路，然而苏联却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妄想控制中国。苏联党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sup>②</sup> 1958年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就是个生动的例子。<sup>③</sup>

中苏关系破裂使得两国开始带着情绪化进行非理性竞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在工业产值上赶超英美的竞争。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方面，苏维埃国家在今后十五年内不仅能赶上，而且能超过目前的美国”。面对赫鲁晓夫的“豪言壮志”，毛泽东不自觉地把中国绑在了苏联的战车上，提出要让中国钢铁产量在十五年内赶超英国，<sup>④</sup> 其后又提出五十年内赶超美国，由此形成了毛泽东“赶超英美”的战略思想。表面上看来，这是东西方世界的竞赛，实际上隐含着中苏的竞赛。中苏两国不存在制度优势，两国领导人寄希望于这种竞争方式来抉择出探索新模式的成功与否。此后中国为了迅速实现所制定的“赶超英美”目标，国内“赶超”思潮盛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在生产关系上“赶超”思想的体现，全国人民迫切地希望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实现生产力巨大发展，以竞争过苏联。其二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速度上的竞争。1952年苏共十九大提出，

<sup>①</sup> 人民日报编辑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sup>②</sup>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第542页。

<sup>③</sup> 1958年，苏联公开提出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本质上是侵犯我国主权，对此毛泽东指出这是“在军事上控制中国”，被我国领导人严词拒绝。

<sup>④</sup> 转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年至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01—119页。

“苏联已进入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时期”，“要创造共产主义的一切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sup>①</sup>1956年苏共二十大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接着又在1957年掀起突击建设共产主义的热潮。在这种影响下，毛泽东也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甚至产生了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他指出“自古以来，都是儿子比父亲厉害，学生比先生好，青年比老年强”。<sup>②</sup>可见，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方面，中苏也开启了非理性竞争。总之，基于以上两方面非理性竞争，再加之党中央认为“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将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sup>③</sup>。于是中国选择了人民公社作为过渡形式，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中华大地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 （2）、借鉴苏联集体农庄模式

其次，苏联农村的制度模式对我国农村社会制度选择起着借鉴作用，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推行是受苏联集体农庄的启发。苏联集体农庄是在农村实行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其高级形式是农村公社。20世纪30年代初，农村公社开始在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中建立起来，其实行生产、生活和分配上的全面生产资料公有化，包括社员房屋、牲畜等，这与我国人民公社制度的“二公”特点极为相似。实际上，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的话语中探寻而来，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sup>④</sup>。而该书正是斯大林对苏联集体农庄的低级形式和全民的高级形式的一些观点概述，毛泽东对此学习和重视，启发了他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理解集体与全民所有制。由此可见，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起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是对苏联集体农庄的效仿。

## 2、波兰与匈牙利事件引起国内政局动荡

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动荡形势还体现在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苏不满的斗争上，尤其是反苏反共的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十月事件。这两个事件是指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了反苏反共的大规模群众示威和游行，甚至升级为骚乱和武装暴乱。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主要包括两国对斯大林时期以来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不满，再加之不满国内执政党制定的政策，以及西方国家的鼓动和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煽动。于中国而言，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五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298页。

<sup>②</sup>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插话。

<sup>③</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67页。

<sup>④</sup> 转引自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240页。

度关注和重视，因为波匈事件不仅是两国的问题，更是关乎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问题。从爆发原因上看，波匈人民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本国执政党的不满足以令毛泽东警惕。仅从1956年10月21日到11月9日的20天时间内，中共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十三四次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sup>①</sup>党中央认为波匈事件尖锐地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此外，波兰党于七中全会上反思事件的责任，更是尖锐地指出了其执政党的错误，“极大部分的责任要归中央和地方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证明在党同人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着重大的错误”<sup>②</sup>。正是因此，毛泽东吸取波兰党执政教训，开始了国内整风运动以加强执政党建设。然而整风运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机会掀起了反共反社会主义攻势，这本可以针对性地解决这些极少数分子，但是由于波匈的前车之鉴再加之毛泽东对波匈事件的高度警觉，致使国内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社会风气不自觉地向“左”倾斜了。“左”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展开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总之，波匈事件和国内右派分子的进攻环环相扣地促成毛泽东反右派思想的根深蒂固，而毛泽东作为国家领导人其影响力波及整个中国社会，最终致使“左”倾思潮弥漫，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这种错综交织与环环相扣下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 二、内因：国内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综合因素作用

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探析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之因，要对我国这个主体内因进行深入地探寻和分析，从我国社会发展内部视角出发，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或者整个社会心态。我国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自然是体现着党中央的谋略和打算，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利益，然而实践证明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一次错误的尝试。它的发动与我国社会发展多种因素相联系，这其中涵盖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总之，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综合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 （一）毛泽东与党中央的决策与理论失误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出现固然离不开当时的客观环境，但也不能忽视主观因素，其在一定程度上是毛泽东与党中央决策与理论失误的结果。

#### 1、毛泽东个人因素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为什么选中人民公社制度作为生产关系改革的模式？这肯定不是一时兴起，实际上是有着复杂的主观思想认识根源

<sup>①</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405页。

<sup>②</sup>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406页。

的。

### （1）、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影响

其一，毛泽东不适当地沿用了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推崇军事共产主义生活。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过了22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生活平等，搞供给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我们就依靠这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sup>①</sup>由于有这个成功的经验，毛泽东认为在建国后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仍然适用，于是发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人民公社中沿用和大力推崇供给制。然而，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应在历史的联系中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实际上，历史条件变化了，相应的制度也需要创新。新中国的形势早已不同于战争时期，建国后人民渴望更好的生活水平，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只能满足基本生存，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文化需要。因此，实行供给制的人民公社，不仅没有产生预想的积极效果，反而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给新中国带来了巨大损失。

### （2）、新村主义未完成的宿愿

其二，毛泽东受到青少年时代接触过的某些政治思想的影响，其中的新村主义信仰以及未完成的新村实验是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心理动因之一。毛泽东早年深信新村主要信仰，新村主义主张进行“共产村”实验，毛泽东就曾与蔡和森等计划在长沙岳麓山进行建设“新村”的实验，还发表了《学生之工作》一文，详细描绘了“新村”的蓝图。他指出“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sup>②</sup>奈何历史条件不足，新村实验的结局注定失败。仔细对比人民公社与毛泽东的“新村”蓝图可以发现，二者极为相似，可见在建国后毛泽东把这个未完成的宿愿寄托到了人民公社之上。

### （3）、推崇个人崇拜

此外，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其影响力不言而喻，毛泽东的主观想法直接影响到全国人民，甚至发展为对毛的个人崇拜，正因如此，人民群众无条件地支持和助力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当时流传着了一首民谣，前部分是“毛主席真伟大，叫咱干啥就干啥”，这直接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后部分是“他说人民公社好，咱们就搞公社化”，

<sup>①</sup>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522页。

<sup>②</sup>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1919年12月28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449—456页。

这更是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影响了其对农村人民公社化的态度。不仅是人民群众极力崇拜毛泽东，连毛泽东本人对群众崇拜他都是接受和默许的。毛泽东甚至将这种维护个人崇拜的想法在成都会议上公之于众，他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sup>①</sup>由此可见，不光是人民群众甚至是毛泽东也犯了个人崇拜的错误。个人崇拜导致的最后结果是毛泽东的主观想法被人民群众无条件接受和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错误运用群众运动的产物。

## 2、毛泽东与党中央决策与理论失误

毛泽东与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认识僵化，尤其是曲解了“资产阶级法权”理论，犯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马克思首次提出“资产阶级法权”，用以解说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之间相交换的平等权利。他指出“这种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但是他也强调了“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sup>②</sup>然而毛泽东与党中央错误地照搬并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忽视了马克思强调的资产阶级法权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不可避免的理论。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在党内引起热烈讨论和赞同，党内把工资制看成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把资产阶级法权理解为资产阶级性质的东西。<sup>③</sup>因此人民公社化运动否定按劳分配并实行供给制，一味追求公有制程度。

## 3、党内民主建设问题

考察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党的决策错误问题，可以探寻到党内建设存在弊病，即党内也普遍存在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党内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破坏。当时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也非常崇拜毛泽东，柯庆施最为明显，甚至可以说完全失去了理智和自我思考。柯庆施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sup>④</sup>可见，党内确实存在个人崇拜之风。这是其后代党中央所承认的，“党中央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sup>⑤</sup>。连党内都有崇拜毛泽东之风气，何尝不会以上带下刮起崇毛之风呢？个人崇拜问

<sup>①</sup> 转引自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32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11—12页。

<sup>③</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540页。

<sup>④</sup>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32页。

<sup>⑤</sup>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02页。

题致使党内民主无处可存，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在盲目服从中错误地发生了。

## （二）多种社会思潮的影响

我们反对英雄史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决不仅仅是个别领袖人物的主观意志所能完全决定的，它是与整个社会心理的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时整个社会思潮涌动，深刻影响了人民心理状态的变化，主要归结为“左倾”思潮，“赶超”思潮，盲目服从即个人崇拜思潮，唯心和空想思潮。通过上文论述，“左倾”思潮是通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形成的，“赶超”思潮源于与苏联非理性竞争，盲目服从思潮源于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崇拜。因此这里重点考察唯心和空想思潮，此弊病在当时党和人民中间普遍存在着。由于前期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成果，在胜利面前党内骄傲情绪明显增长，在全社会也逐渐兴起了唯心的风气。1958年5月，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他指出“凡是人类能够做的事，我们都能做，或者很快就能做，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做到”。<sup>①</sup>以及“大跃进”运动中人民宣传的口号，“人有多大但，地有多大产”，这些都是一种唯心指导下的错误看法。可见党和人民已经走向了唯心的错误道路，他们认为“事在人为”，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企图用群众运动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飞跃，由此发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此外，上文已经探讨过“左倾”思潮产生之因，这里需重点再探讨“左倾”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的巨大影响。可以说，“左”的思潮是贯穿社会主义初期探索道路始终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完全肃清，其中虽伴随着与右倾主义的反复斗争，然而“左倾”仍然是社会思潮的主旋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虽受多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但是“左”的思潮是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正是在“左”下，这两者出现了扩大化。相应地，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错误发动的四清运动与惨烈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深受“左”的影响。正是因为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党中央仍然对“左”没有完全肃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革的发动。可见“左倾”的危害，其带动了几场运动的错误发动，严重影响了我建设进程。研究“左倾”是对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深化，是对社会主义初期探索道路认识的深化。时过境迁，教训有益，正确地看待“左”和规避“左”对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有裨益。

## （三）国家战略任务的影响

### 1、工业化战略与统购统销的需要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04页。

建国初期，由于国内外形势严峻，我国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的发展战略。然而此时我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农业大国基础上开始工业化建设的，加之外国封锁，我国工业化建设只能从国家内部依靠农业来作为发展工业的基础条件。毛泽东曾指出这个问题，“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sup>①</sup>因此为保证实现工业化战略，我国开始于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即由国家重要产品统一收购统一供应，由此制造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工业品售价之间的“剪刀差”来为工业建设提供资金积累。然而统购统销政策本身就存在缺陷，其面临着需要对接分散的个体农户的问题，加重了该政策实行的成本。此外低价收购农户的农产品，也势必损害农民的利益，造成农业生产积极性低下。如何合理处理农民利益与工业建设需要之间的关系呢？为此，我国实行了农业合作社，尽管解决了农户分散的问题，随之产生的却是基层政权和合作社之间的矛盾。合作社是集体经济组织，基层政权是实行统购统销的行政机关，当基层政权发布的指令与合作社经济利益冲突时，一定程度上会出现合作社不执行或加以抵制的情况，因此党中央选择将二者合而为一，形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政社合一的特点使得统购统销政策实行较为顺利，正如毛泽东所说“社并大了，头少了，好管，好纳入计划”<sup>②</sup>。总之，人民公社作为政社合一的组织，便于统购统销政策的顺利开展，从而能助力我国工业建设，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这种需要下发起了。

## 2、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错误

原本中共八大确立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在左倾与右倾的反复斗争下，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左倾”又在党和群众中占了上风。于是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新的总路线取代了中共八大的正确方针。虽然党中央一再强调处理好“多快好省”的关系，但是群众中多注重“多”和“快”，却忽略了“好”和“省”。其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更是助长了群众追求速度。在这条总路线下的“指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这三者当时被称为“三面红旗”。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公社化运动也离不开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影响。

## 3、大跃进背景

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大跃进”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大跃进”是生产力上的急于求成，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2页。

<sup>②</sup>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767页。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生产关系上的急于过渡，生产力的急于求成促进生产关系上的急于过渡。上文已经谈及中国受苏联影响，形成了“赶超”思潮，国内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左倾”浪潮涌动。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全国范围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尤其是全国农村在1957年冬至1958年春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生产建设高潮。由于兴修水利需要集中人力，村与村之间自发形成了生产协作，农村中开始出现小社并大社的情况，后经毛泽东定名为人民公社。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水平的发展需要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大跃进”的一系列高指标的实现需要依靠生产制度的进步，这也就产生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人民公社化运动。总之，人民公社化运动源于“大跃进”的需要，也是“大跃进”的结果。

#### （四）集体动员体制的错误发动

党有着长期群众运动实践的经验，如五四运动与解放战争中的第二条战线等。然而经济建设不同于革命斗争，仍搬用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是错误的。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的问题上，首先党在思想方面错误地运用了群众运动，为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提供了思想条件。这体现在反右派斗争上，反右派斗争之所以扩大化就在于党中央错误地以群众运动方式向右派分子进行了反击，然而群众运动一经发动便往往很难加以控制，因此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其最终的结果就是过分反“右”导致了“左倾”思潮弥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左”的弥漫下展开了。其次党在经济方面也即生产关系变革上也错误地运用了群众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本是经济关系中生产关系的一次伟大变革，理应按照经济规律推行，但党中央错误发动了群众群众以致一发不可收拾。当时社会上大力宣传“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到最好的组织形式”<sup>①</sup>。这种宣传对当时渴望美好生活的民众来说具有致命的吸引力，无疑是一种成功的群众动员，其后全国人民争相恐后地建立人民公社，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浪潮，致使最后人民公社出现问题时呈难以挽救之势。

综上所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现实根源，既有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满含着中国人民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渴望，各种影响因素是交织形成、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和人民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一次伟大尝试但也是失败的尝试，其不顾经济规律的大搞绝对平均主义造成生产力极大破坏。不过在建国初期党和人民

<sup>①</sup> 国家农委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献汇编》下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72页。

“摸着石头过河”，对于创业者们的不成熟，不应过多苛责，重要的是把它当作历史的一部分进行严谨的研究，从中得到有益经验，永远殷鉴。因而，在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应科学地认识和分析这次制度变革产生的原因，为今天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的制度模式变革的经验，从而助力我国“三农”问题的成功解决，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 参考文献

### 著作：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 [2] 国家农委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献汇编》下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
- [3]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湖南出版社，1990年。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
- [5]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
- [6]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 [7]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年至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
- [8] 安贞元：《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 [9]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 [10] 罗汉平：《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
- [11]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
- [1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 [14] 何学慧：《新中国历程探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 [15] 董志凯：《应对封锁禁运：新中国历史一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 [1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
- [17] 李扬、武力：《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

### 期刊：

- [1] 张桂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社会思潮问题》，《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 [2] 黄金魁：《农民社会心态与人民公社化运动》，《零陵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 [3] 马晓兵：《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原因研究述评》，《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1期。
- [4] 李梅：《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因及影响研究》，《中共陕西省委党校》2015年第3期。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auses of the rural people's communization movement from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nameNiu Liya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 Hebei Province, Postal Code: 050010)

**Abstract:** In the 60s of the 20 th century,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developed in a tortuous way in the course of exploration, and the rural people's commune movement came into being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reason for the initiation of the rural people's communization movement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twining of various factor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initiation of the movement can b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External factors refer to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hich mainly consists mainly of the hostility of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 and the "turmoil" within the communist camp. The internal factors focus on the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China, mainly the decision-making and theoretical issues of Mao Zedong and the central leadership,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social trends of thought, especially the influence of "left-leaning" ideas,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strategic task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entralized mobilization system.

**Keywords:** Rural; People's Communization Movement; Causes; Left-leaning ideology